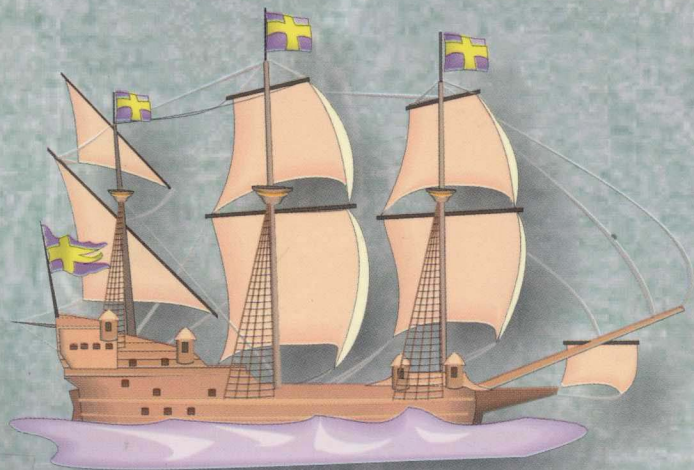


丁晓原【著】

“五四”散文的现代性阐释



苏州大学出版社

虞山学术丛书



“五四”散文的现代性阐释

丁晓原【著】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584906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散文的现代性阐释/丁晓原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9
(虞山学术丛书/丁晓原主编)
ISBN 7-81090-152-4

I. 五… II. 丁… III. 散文-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908 号

“五四”散文的现代性阐释

丁晓原 著

责任编辑 王英志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 215021)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装

(地址: 常熟市元和路 98 号 邮编: 215500)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47.75(共八册) 字数 957 千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90-152-4/C · 5 定价: 128.00 元
(共八册)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258802

《虞山文库》总序

许 霆

虞山,以“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姿态与文化历史名城常熟融合,对常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巨大,并进而成为常熟的别名和常熟文化的标志。商末,周太王长子泰伯、次子仲雍让国避奔江南,建立“勾吴”,泰伯、仲雍相继成为首领。仲雍死后葬于常熟卧牛山,仲雍又名虞仲,山遂以虞为名。春秋时期的言偃生于常熟,北学中原,成为孔门七十二贤人中的“十哲之九”,晚年回归故土传道讲学,“道启东南”,“文开吴会”,死后葬于虞山东麓。仲雍和言偃,昭示了常熟文化源头的深邃和博大,标志着吴地早期文明曙光终于开启出一个区域文化的圣地。

常熟文化发展绵延不绝。南北朝昭明太子的“文选”,开始了常熟文化发展的自觉时代;自唐代陆贽高中状元,常熟历史上出过8个状元483个进士;北宋时郑时性嗜书好藏书,开了明清时代常熟出版、藏书兴盛的先河,赵琦美与脉望馆、瞿氏与铁琴铜剑楼、毛晋与汲古阁都对中国文化史作出过重大贡献;元代的黄公望,以其绘画理论和创作开创了明清山水画的新纪元;明清之际以王翬为首的“虞山画派”、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严澂的琴学理论和虞山琴派,还有虞山书派、虞山印派等,都达到全国一流水平,影响一时风气;近代

以来,黄人的文学史论、曾朴的谴责小说等,表明常熟文化在求新变革时吐故纳新的活力。基于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常熟当代文明,更是显示了勃勃生机。

常熟高等专科学校就坐落在人文荟萃的虞山脚下,接受着常熟深厚博大的传统文化和生生不息的现代文明的滋养。学校在与地方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发展中获得不竭的创造精神,塑造崭新的主体形象,确立自身的价值目标。学校有一批人文和理工学人,更是为常熟的传统文化甘泉所浸润,以虞山的人格精神塑造品行,用致远的人生追求敬业乐教。宋人朱熹在《丹阳公祠堂记》中说言偃为人,“必当敏于闻道而不滞于形器,岂所谓南方之学,得其精华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明末龚立本纂修《常熟县志》15卷,其中《风俗志》说常熟士人“贫不负诺,富不易交,吐纳风流,意气横溢。表人胜士,千里命驾者比比,人物显晦殊途,或矜名节,或树勋庸,或敦学术”,这都揭示了常熟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人格精神。这种精神是常熟文化生生不息的产物和动力,也是常熟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的底蕴和财富。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的学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自觉地从立足的虞山福地的传统人格精神中汲取营养,坚持自强不息、敏捷好学、达美达诚的学风,在学术园地和育人园圃播种、耕耘和收获,形成了一批学术探索和教学研究成果,这是可喜可贺的。

常熟虞山,由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不断的文化传承,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创造的意象。正因为如此,我们愿意把这批初步的成果以“虞山文库”为名,汇集出版。我们无意创造学派,而意在宣示精神,表明当代学人对传承人文传统、创造现代文化使命的一种担当。我们衷心希望这项工作能够继续下去,能有更多的成果充实文库,承当起当代学人文化建设的重任。

2003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五四”散文的现代性及其生成	(1)
第二章 “五四”社会派散文:现实与文化的批判	(28)
第三章 “五四”人生派散文:人与自然的交响	(43)
第四章 鲁迅:现代散文的文体家	(60)
第五章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89)
第六章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散文的精神关联	(107)
第七章 《语丝》:现代散文文体自觉的代码	(136)
第八章 诗意的私语:《小说月报》散文的话语 类型	(160)
参考文献	(179)
后 记	(181)

第一章 “五四”散文的现代性及其生成

1

“五四”是一个界碑,将永远地矗立在历史的风景里。无论是激扬者,还是反思者,“五四”是无法绕开或被障蔽的存在。永远的“五四”是一个复调化的历史结构,即所谓“文化的”“五四”和“政治的”“五四”。在我们的论域内,“文化的”“五四”其实也具有复指性——“文学的”和“人文的”“五四”。对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权威发言人之一胡适曾作过分析。他说“五四”运动,“首先,它是一场自觉的,提倡用民众使用的活的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旧语言创作的古文学的运动。其次,它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这是一场理性对传统,自由对权威,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对压制生命和人的价值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被看成是预示着并表明了一个古老民族和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生的运动。”^{〔1〕}胡适的表述,揭示了“五四”对于造就了中国文学和人文的现代品格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我们给出“五四”散文的现代性这一课题。在这一课题中包含了三个学术关键词,即“五四”、散文和现代性。研究“五四”,研究“五四”散文,研究“五四”现代性,单独地研究

〔1〕《胡适的自传》,《胡适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其中一个方面,早已不是新鲜的学术课题。但是将三者关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加以深入的阐释,这不仅颇有新意,而且将有助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研究的深化。我们拟做的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散文现代品格的特质及其生成缘由,这样“现代性”就成了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的“视窗”。而对象发生的时空背景是“五四”时代,且“五四”与其时的散文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散文的现代性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孵化出来,另一方面具有现代品格的散文,又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或成为新文化传播的载体,或直接参与了新文化的建设,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五四”不仅成为研究的背景,而且也是研究的一个对象。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散文本体,通过一个具体的视角,去看取“五四”时代文学与文化由传统而至现代的转型图景,另一方面结合“五四”的时代语境,以“现代性”作为观照开掘的尺度,描述并论析中国散文现代性的表征及其生成缘由,由此阐释“五四”散文何以成为20世纪中国散文标志的内在肌理。

在展开论述前,我们先要对本论题主要涉及的学术关键词作必要的界定或解释,以使我们的研究能纳入一定的逻辑轨道。

其一是“五四”。“五四”是一座富矿。这里,我们仅就它的时间所指作一约定,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研究对象的取样。学界对于“五四”关联的时间跨度,有诸种界说。诸种说法基于不同的角度,大约都有成立之理。早在20世纪30年代,茅盾在《“五四”运动的检讨》中,对“五四”的时段有一指说:

“‘五四’这个时期并不能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它延长到‘五卅’运动发生时为止。这应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算起,到后二年或三年止。总共是五六年的时间。”〔1〕茅盾的指说排除了将“五四”运动仅仅视为政治事件的狭隘的解释。文学史家王瑶在《“五四”时期散文的发展及其特点》中也涉论“五四”的时段:“我们现在所谓‘五四’时期,是指‘五四’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时期,即1919年到1927年。在时间概念上与过去习惯所指的新文学运动第一阶段并无很大差别,只是他们的出发点是由1917年提倡白话文算起,到1927年算作第一个十年而已。”〔2〕将“五四”时期定为“1919年到1927年”基于更多的是政治史的考虑,而将“五四”时期的起点定在1917年,则注意到了将新文学革命视为“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十年说”为许多治现代文学史的学者所普遍接受。关于“五四”历时长度,我更愿意认同昌切于晚近提出的说法。昌切说:“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并迅速以其咄咄逼人的气势震撼了思想文化界,左右了舆论视听,引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1927年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四·一二’事变,国共两党分裂,思想主潮自此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急转。把这样两大历史事件视作‘五四’时代之始终的标志,大体上是合理的。”〔3〕昌切将“五四”指称“文化”的“五四”,这更符合“五四”价值生成的历史本身。他将陈独秀主持的《青年杂志》的创办,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的标志,这也符合历史的当事者的本

〔1〕《茅盾全集》第19卷第2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2〕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第2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昌切:《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第98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意。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中指出：“在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迄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1〕}《青年杂志》于192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于次年9月1日刊出第2卷第1号时，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是颇为自负的一个人，在《一九一六年》他虽未径言他所创办的刊物开启着一个全新的时代，但其中包含着的正有这样的意思。对此胡适也认同，他认为，《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这样，我们所研究的“五四”散文，可以明确为是在1915年到1927年间写作的。但考虑到涉论的作家是一个整体，简单地以时间切割有时不利于分析的完整；因此，我们在论析鲁迅、周作人等作家时取材的时限将作比较灵活的处理。

其二是“现代性”。学界有人用“现代性汪洋”来讥讽现代性研究所出现的芜杂现象。其实，芜杂并非一定指一种否定性的存在。由于研究主体的视角或研究对象的所指等有着许多差异，所以我们所见的“现代性”就不会是划一的了。但在我看来，我们所讨论的“五四”散文的现代性，虽然或许也会出现诸多的歧说，但其总体性的指向，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即应是指散文内在的现代品质和形态的现代特征。从品质而言，现代性求取的是普遍的价值原则：“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

〔1〕《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1〕按照张辉的理解,现代性至少具有三层含义:“首先,从精神发展的历程上说,它是人的主体性确立的表征,具有现代性精神的人,按照自身的内在性(Inwardness)来对外在世界作出判断,而不是按照超验原则或传统的规范来行事;其次,从社会运行原则来说,现代性是合理性的产物……三,从知识学的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给定了不同知识模式以相对的独立性,不同的知识部门为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的合理性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知识学的证明与辩护。简言之,现代性的内涵,包含这样三个主题: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无疑,这三者又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2〕以上关于现代性言说的框架,大体上可以作为我们分析“五四”散文精神的基本的理论模式。诚然,我们不能教条地套用着这些理论资源去解释对象。在我看来,以上有关现代性的基本的价值原则,实际上历史地包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包含在其时的散文中,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从中加以提取或提炼。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解析的现代性,并不指向背景更为广阔的思想史或文化史,而是一种特殊的文类。尽管“五四”散文是研究“五四”思想史或文化史的重要的材料,但散文毕竟是一种语言艺术,它的现代性有着本体性的特征和表现形式。正如有学者所指认的那样,在文学史的系统里,现代性与文学性是关联着的:“现代性与文学性是‘兼容’的,现代性不仅表现在文学作品的思想、意识、理念中,更加体现在它们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中,体现在两者的融合中。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若离开了它审美方面的现代性,根本无法得到深刻、充分

〔1〕 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2〕 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的阐述。”〔1〕就“五四”散文而言,它的现代性除了情志意思等内蕴构成外,还包括它的形态体征、话语方式、语言工具等。形态之类并不独立于内蕴之外,它们以整体呈现着散文现代性的存在。王瑶在论述“五四”文学革命的“现代化”特征时指出:“‘五四’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它的历史意义就是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现代化。什么叫文学革命?就是要求用现代人的语言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现代人的语言就是白话,现代人的思想就是民主主义。”〔2〕将这一段论述用以指说“五四”散文也是恰当的。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散文现代性的生成,是“五四”散文“革命”的直接结果。这种“革命”体现为现代人以自己的思想方式与语言方式的合成,共构着一种新的散文文体。

二

自由精神是文学的精神核心。这是文学原初的重要的旨意,也是它的一种终极价值。保罗·萨特有言:“不管作家写的随笔、抨击文章、讽刺作品还是小说,不管他只谈论个人的情感还是攻击社会制度,作家作为自由人诉诸另一些自由人,他只有一个题材:自由。”〔3〕文学原本应是人类创造的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生命、关于自然、关于自我等有意蕴的自由书写。但是在相当长的文学发展历史中,作家写作的自由或被剥夺或被囿于一隅。尤其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

〔1〕朱立元:《论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预设》,《学术研究》2003年第3期。

〔2〕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第2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萨特:《为了什么写作》,收入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中,更缺少有关自由的精神资源。作家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恪守着具有特定内涵的“文以载道”的准则。所谓“道”也就是桐城派作家倡导的“义理”、“辞章”、“考据”中的“义理”,往往是一种“卫道”之道,导源于为体制所重的“经”：“文以载道，六经皆载道之文也。故言文者，必权舆于经。韩退之论文曰：‘养其根而俟其实。’经，其根也；文，其实也。又曰：‘加其膏而希其光。’经，其膏也；文，其光也。柳子厚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皆所以取道之原也。”“文不宗经，譬犹木之无根，水之无源，欲其末之茂，流之长，不可得也。”〔1〕这是封建时代文人写作皆有所本的规约，而其旨归则在于维护或完善封建体制的运作，这样作者主体以及写作本身被淡化了。正如方苞在《古文约选》所说的那样，“群士”求取的“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鉴我皇上爱育人才之至意”。由此可见，传统的散文写作大多命定着与主体心灵的自由是无缘的。

散文之散，本有散漫无拘的意义在内。随心所欲而有情味理趣性灵，正是散文审美内蕴之要素。散文写作的理想境界一如有宋文章大家苏轼所描绘的那样：“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苏轼的散文有此境界，这倒并不是社会为他提供了宽松自如的写作氛围，而恰恰相反，现实处境的逼仄险恶，人生仕进的失意困顿，使他身心疲惫。放达的苏轼将写作作为自我拯救的方式，通过写作，演绎心灵渴望自由

〔1〕 奕沂：《乐道堂文钞自序》（节），收入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理论集一》第447页，上海书店1994年版。

放飞梦想,以写作中获得的自由体验作为现实拘囿无奈的一种补偿。苏轼在古代文学史中只是并不多见的个例。作家生存的现实及其主体心灵普遍的“失我”,从根本上决定了散文不可能成为一种自由的文体。一个散文的时代,应是一个散文作家能够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时代,或者是思想文化人士争取自由言说而能得到或部分地得到自由言说的时代。“五四”时代,由于国际、国内特殊情势的诸多历史性因素合力所致,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对知识分子来说最为独立而自由的时期。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得以自由言说的时代,无论是外向的对社会发言,还是内倾的自言自语。散文是一种逞心说话的形态。对于“说话”,鲁迅认为:“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1〕}想说并且说着“现代的,自己的话”的并不只是鲁迅,而是“鲁迅们”。于是一个散文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观察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文化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又成为“五四”时期主要的散文作家。散文文体自我抒写更为率性自如,论评天下更为意气风发,使其成为他们精神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成为他们文化启蒙的一种重要载体。《新青年》是一方新文化酿造传播的中心,同时又是造就“五四”散文作家的一个重镇。这种合二而一的“《新青年》现象”,对我们研究“五四”散文的现代性有着直接的启示意义。在我看来,散文作家的入世精神与散文本体批判性主旨的空前的凸显,是“五四”散文最可显见的现代性景观。

〔1〕 鲁迅:《鲁迅全集·三闲集·无声的中国》第4卷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林毓生在谈到“五四”精神时,曾说:“什么是五四精神?那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人世使命感。”^{〔1〕}“这种入世的使命感是令人骄傲的五四精神。”^{〔2〕}林贤治在《五四之魂(上)》中指认“五四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解放的精神,创造的精神”。^{〔3〕}林毓生和林贤治关于“五四”精神的标示虽然不一,但其中实有关联之处。“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人世精神并不类同于儒家传统中“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他们的入世,是为了拆解现存的社会秩序,让人从封建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灵性,以实现文化创造和社会更生的使命。现代性是相对传统性的一种品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意味着创造或创新。晚清至“五四”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的求取,在语言上醒目地表现为“新”字:“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概念表现出一些很突出的不同之处,自清末以来,日益‘面向当前’的意识形态(与古典的面向过去的儒学相对立),无论在字面还是在象征性上都充满了‘新’的内容:从1898年的‘维新’运动到梁启超的‘新民’概念,以至五四时期出现的‘新青年’、‘新文化’和‘新文学’,几乎所有为将中国从过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建立‘现代’国家的社会和思想运动,都伴随着一个‘新’字。”^{〔4〕}但“新”的大厦很难在“旧”的基础上建筑,于是破旧立新就成了其时知识分子的要务,而且由于求“新”心切,所以破“旧”之言也屡见极端。政

〔1〕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14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2〕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14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3〕 林贤治:《五四之魂(上)》,《书屋》1999年第5期。

〔4〕 李欧梵语。《晚清剑桥中国史》(上)第5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治学家亨廷顿对现代化过程中的这种景况作过分析。他说：“在此过程中，一大堆陈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上的信条被侵蚀甚至粉碎，而人们也变得合乎新的社会化和行为的模式。”“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革命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1〕这里所说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其所指的即是陈旧布新的时代“另类”。“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少就是这种“革命的知识分子”。

从某种角度而言，批判性也就是现代性。正如李欧梵所说：“现代性本质上就是破除对传统的迷信，并从精神上寻找新的解决途径。”中国现代文学“反映出作家们对政治环境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态度是五四运动最持久不衰的遗产”。〔2〕在特定的时代，有抱负的作家历史地承担文化革故鼎新的使命，充当着思想启蒙者的角色。当其时，知识分子型的作家往往是一种文学工作者与思想启蒙者合一的身份。对此，沈雁冰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中说得十分明白：“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借文学的描写手段和批评手段去发聋振聩……中国现在正是新思想勃发的时候，中国文学家应当有传播新思想的志愿，有表现正确的人生观在著作中的手段。”〔3〕文学家在促进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以文学的形式传播新思想，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以载道”。因为新思想并不是体制中的“道”，而是表达了人类的普遍精神与公理原则，它对扼杀人性的文化和不合理的社会存在的批判，正表明了对人性之光的弘扬和建

〔1〕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3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2〕 李欧梵语。《晚清剑桥中国史》（上）第5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全集》第18卷第8页。

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的憧憬。

“五四”散文家有着自觉的批判意识。鲁迅对作家诗人只作一些用以粉饰或游戏的诗、小说，颇为不满，认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他以对杂感写作的热衷，作着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示范，表示“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1〕杂文是一种以批判性见长的文体。“五四”时期杂文成为散文大类中的主类之一，尤其是前期成为其中的主类，表明具有知识分子角色自觉意识的作家，对于“文明批评”、“社会批评”的责任的主动担当。《新青年》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但它是批判作为手段的，这种手段的语言表达形式即为政论、杂感。《新青年》首开“随感录”专栏，前后共刊发一百多篇文章。创刊于1918年12月的《每周评论》，正式出版36期，“随感录”为其贯穿性的重要栏目。《语丝》周刊，虽然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杂文与美文共构的基本格局，但无疑在这一格局中，杂文是作为主体出现的。

《新青年》、《每周评论》和《语丝》等刊物开设的杂感类栏目，造就了现代中国第一代杂文家。陈独秀是《新青年》杂文的主要作者，蔡元培对他杂文的主旨倾向曾有总括。他在《独秀文存·序》中指出：“这部文存，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即是周作人，这位倡导美文并身体力行，后来终于成为“隐士”的作家，也曾经以杂感塑造着自己作为旧文化“叛徒”的形象。在《雨天的书》自序二中，周作人对自己的写作有一评述：“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

〔1〕《鲁迅全集·两地书》第11卷第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